

「救」「拉」并举分类施策保市场主体

□ 陈 龙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保”任务，“保市场主体”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当前，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企业状况有所好转，但其生存和发展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亟须“救”“拉”并举、分类施策，提升“保市场主体”的实效。

保市场主体的核心在于保中小企业

市场交换、经营活动的参与者都属于市场主体，因而它实际上是包含企业、个人和家庭等在内的广义集合概念。中央提出的“保市场主体”具有特定的涵义，主要是指保企业。由于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保市场主体的核心在于保中小企业，这不仅保就业、保民生的根本，而且事关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中小企业活力不足、生存困难，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主要症结点。虽然我国各地中小企业复工速度较快，截至4月15日，复工率已达84%，4月中下旬以来，部分线下消费开始加快修复，但威胁中小企业倒闭的因素仍存在。一方面，外需和消费需求不足，客户、订单减少，就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和营业收入必然减少。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4，跌破荣枯线。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并且4月收缩幅度大于2月。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即便复工复产之后，部分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幅度仍较大。某省统计资料显示，52.1%的规下工业企业、62.4%的建筑业企业、54.9%的规下服务业企业低于正常生产水平的50%。另一方面，人工、租金等成本费用继续累积，以及库存资金占用等问题，使企业的成本压力持续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3月工业产成品库存增速从去年的2%攀升到14.9%。经营收入难以弥补其成本，显然这种状况不能长时间持续。如果经营状况无法改善，其中的部分企业必然倒闭。

从疫情影响的趋势上来看，随着复工复产的加快，短期的冲击逐渐演变为长期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消费习惯的改变、居民就业和收入变化、欧美等供应链回流和区域化趋势以及全球环境其他变化，都将给中小企业带来长期生存压力。

把握好保中小企业的策略和重点

部分中小企业继续闭在所难免，但我们应着力防止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进而对就业、民生和制造业发展造成较大冲

击。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只要应对策略和措施得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个有效的救助政策体系需要符合“快速、有力和精准”的原则。快速，亦即宏观形势的变化很快，政策出台和落地的速度也要快，快速救助可避免事后较高的处理和应对成本，行动越早，成本越低。有力，亦即救助的资金规模以及其他救助政策的力度，必须与我国经济规模、中小企业总体规模相匹配。如果量过小，犹如蜻蜓点水，效果必然不佳。精准，亦即找好政策着力点和救助的对象，应主要定位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潜力但又临时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并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总体而言，保中小企业需要做好“救”和“拉”两个方面，即“救一部分”和“拉一部分”。

“救一部分”，是指通过减免税费和租金、实施信贷资金紧急救助、畅通产业链等措施，帮扶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防止其资金链断裂，使其能够活下来。在正常运转中，企业的价值可以体现，但一旦倒闭，其价值就会大为缩水，甚至成为“一堆烂摊子”。这需要针对具体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不同的困境，分类施策，精准救助。

“拉一部分”，则是指通过扩大总需求，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以总需求的扩张产生经济联动效应，增强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将部分中小企业“拉出”困境，使其动起来、活起来。这就需要快速实施一系列扩大总需求的宏观政策。当然，并非单纯的“为拉而拉”“为扩而扩”，而应当与补短板结合起来。实际上，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需求相比，我国还有很大政策实施空间；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保中小企业，应有所侧重。首先，需要保的是外贸制造业中小企业。由于此类企业不仅对我国的就业影响较大，而且对制造业水平、生产力，以及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安全性等产生重大影响。其次，需要保的是影响就业较大的生活服务业，如餐饮业等。

“救”和“拉”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不仅能给中小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还能产生改变市场预期、提振信心的效果。

救拉并举、分类施策，提升保市场主体的实效

提升保市场主体的实效，需要按照“快速、有力和精准”的要求，根据中小企业面临的痛点，救拉并举、分类施策，给予中小企业自救的时间和空间。

其一，针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分类实施救助措施。例如，对于外贸制造业中小企业，要根据其生产和产品的特点，分类施策，使其运转起来。对于生产终端产品、消费品的外贸制造业中小企业，则要通过扩大新市场需求、实行“外贸转内销”等措施，减轻其压力。但“外贸转内销”存在销售渠道、生产线转向、品牌建设等环节中的难题和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创新销售模式，如拼多多实行的C2M模式，破解其中的难题。对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则要全力使其留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加强市场和产业国际分工的合作和协调，采取跨境电子商务等形式扩大打通国际市场，为其争取“订单”和发展空间。

其二，建立信贷救助资金风险共担机制，提升救助的效果和精准度。由政策性银行和部分商业银行联合设立信贷救助资金，财政以贷款损失准备补贴和担保等形式分担银行风险，以企业免息、财政贴息的形式分担企业风险，同时采取有效的甄别机制，降低信贷风险。根据全球疫情及中小企业状况估算，可将救助期限定为2年，这将为它们生存提供宝贵的2年缓冲和恢复期。

其三，统筹安排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专项债，形成一揽子财政扩张政策组合。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专项债，需要在宏观逻辑中统筹考虑。从第一季度疫情对我国的影响分析，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专项债形成的增量扩张应在3万亿—4万亿为宜。这就意味着要在2019年2.76万亿赤字和2.15万亿专项债基础上，再增加3万亿—4万亿，使三项组合达到7.9万亿—8.9万亿，才能形成有效的总量上的对冲。

其四，依据形势的变化，完善现有的减税降费宏观政策。适当延长前期出台的一些中小企业减免税费、减免租金等政策。优化消费费，不宜设置过多的消费条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人群，以及城乡低保、城乡重点优抚对象等倾斜。

其五，加快政策落地速度，减少时滞影响。宏观政策的效果与行动的时间（即政策从酝酿到实施的时间）成正比，宏观政策快速落地，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有效激发消费潜能

□ 刘维东

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央采取了诸如减税降费、降准降息、扩大流动性、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等一系列积极措施，各行各业在政策推动下全面复工复产，全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复苏向好？

仔细分析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先看出口。近10年来随着国内消费的持续成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2019年出口在GDP的占比仍有1/3。由于全球疫情暴发并持续扩散导致贸易阻断，出口在短期内料难恢复。即便疫情过去，一些发达国家会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恐难以为继，出口转内销将成为常态。再看投资。扩大投资可以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中央已明确明确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搞大水漫灌，因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推动力是有限的。再看消费。由于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出于安全考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消费，市场消费不足，一季度国内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出口、消费双降，四月份经济复苏回暖趋缓，中国经济如何加快复苏仍需破题。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经济减速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复苏向好的关键不在生产端，而在消费端。中国有庞大的工业产能，如果工厂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卖不出去，生产就会萎缩，产能就会闲置，经济循环

就难以持续。目前就是这种状况，由于出口被阻断、国内消费不足，许多企业复工复产难以为继。因此，当下的关键是要为企业生产找出路、找市场，让中断的供应链转动起来，而要使供应链转动起来根本出路在消费。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只要我们精准政策靶向，把城乡居民的消费潜能激发出来，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尽快复苏并保持较长时期中的高速增长。

居民消费率是衡量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76.2%，但居民消费率只有39.1%，而美国同期的居民消费率高达68.1%。有些人看到我国恩格尔系数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就认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消费已经升级了，我国的消费品生产已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了，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中高收入群体的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已基本饱和，更多地倾向于文化、娱乐、休闲等精神消费和健康消费；而对于众多中等收入偏下群体而言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脱贫的农村低收入群体，他们的物质（工业消费品）消费才刚刚起步。2019年，我国每百人汽车保有量只有18辆，全球排名第130位，而排名第一的美国每百人汽车保有量84辆；大中城市吸尘器、电烤箱、微波炉、洗碗机等小家电普及率还不到20%，而发达国家的普及率高达80%；在广大的农村，彩电、冰

箱、洗衣机新三大件还没有普及。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单就工业消费品产能而言不存在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是城乡居民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抑制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以致广大人民群众未能全面分享“世界工厂”带来的工业文明。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一些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与之是不相匹配的。不仅如此，低消费导致消费与生产长期失衡，使得我国不得不长期依赖外部需求来支撑经济发展，而且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只能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解决这一问题，长远来讲要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短时期来讲要通过调节再分配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当前，应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消费、支持消费，把抑制延期的消费潜力迸发出来，使我国超大规模人口真正转化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而为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样，不仅可以推动经济走出困境，稳定就业，实现“六保”目标任务，而且可以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现在世界各国疫情暴发扩散还未看到拐点，什么时间结束尚难预料，全球经济增速必

将放缓，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改观。非常之时当采取非常之举。只有依靠加快释放需求、扩大居民消费，让消费与生产饱和衔接，产业链、供应链有效转动，才能推动经济走出困难、持续向好。为此，建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商业银行发放大宗及耐用工业品消费低息贷款，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日用工业品消费券，高强度、大规模刺激消费，充分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能。具体建议：一是发放汽车消费低息贷款，支持中等收入偏下群体汽车消费，特别是鼓励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中等收入偏下居民购买家用汽车，提高他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二是发放5—10年期低息消费贷款，鼓励城乡居民购买耐用工业消费品，提高家用电器普及率；三是发放普惠性数字消费、智能消费贷款，支持5G、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四是发放日用工业品消费券，改善农村新近脱贫群体及城市特困群体生活。笔者不赞同发放用于旅游、餐饮等普惠性消费券，因为这类消费只是受疫情影响而暂时下降，待疫情完全控制人们出行交往安全无忧之后很快就会恢复。



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重塑挑战

□ 郑东华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加剧了本就已经被有关国家提上日程的产业链重塑趋势，产业链安全成为各国制定产业政策时必会考虑的重要因素，全球产业竞争出现新的特点。面对全球产业链重塑挑战，我国应未雨绸缪，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全球产业链重塑带来挑战

来自有关国家的直接投资相对减少。有关国家制造业回归的实质是产业资本的收缩，产业资本收缩的主要原因是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经济风险高度积聚，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大幅下降。在现有的全球分工格局下，如果贸易物流保持畅通，并且不存在人为导致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全球化是最能实现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但有关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逆全球化”举措，破坏全球供应链，以致全球产业链条上相关环节的调整和替补不可避免，无论是制造业回归还是转移，都意味着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相对减少。

损害我国良性发展的产业集群结构。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国际分工发展与我国本具有的产业基础相结合的产物，在付出“以衬衫换飞机”巨大代价情况下，形成了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较强、高中低端兼有的产业集群和产业结构。近些

年，我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有所上升，但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十分强大，比较优势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如果有关国家一意孤行，采取各种措施迁回海外制造业，那么，由于外资企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一般处于产业链中高端，则可能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短期损害。

加大高技术产品的供应难度和成本。全球产业链重塑在短期内将使原先就近供应的高新技术产品转化为进口，无疑会增加供应的难度和成本。但这种违反市场交易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垄断阻挡不了技术进步，反而会导致有关国家技术产品被其他国家所替代，从而使得其产品由于营收大幅减少，缺乏持续、大额的研发投入而逐渐丧失竞争力。另外，对于恶意断供行为，也将遭到对象国以各种措施反制，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增加我国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难度。产业培育和技术更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去我国主要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但越来越面临两个挑战：从国内看，基础创新、原始创新相对滞后，创新的科学基础和基础教育等软环境出现瓶颈；从国外看，有关国家推动制造业回归或转移，以及一直以来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政策，客观上会加大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条传统技术发展路

径的难度，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对此重视不够、准备不足，就可能长期受制于人而难以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化危为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加大西部地区投资力度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以战略安全和战略发展的视野，在“市场失灵”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全球产业链重塑挑战转化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契机，弘扬“三线建设”“交大西迁”等精神，规划一批重大项目，发展一批产业集群，振兴一批中心城市，带动一批县域经济，引导西部地区人口回流、就业增加、收入增长、市场扩充，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内部需求大幅提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扩大内需。进一步优化分配机制，更大力度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无序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劳动者收入稳定有序增长的前提下，重点加强对教育领军人才、科技领军人才、经营管理者人才、技能专业人才等优秀劳动者的激励，大幅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的放矢地拉动内需。

以国有和民营大型产业集团为龙头打造创新产业集群。发挥国有

和民营大型产业集团在我国产业链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以集成创新驱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以规模采购加强对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导入，带动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共同发展，逐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循环，以内部循环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外部循环，形成内外良性互动、内部自成体系的创新发展生态。

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统筹科技创新与科技培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发展规划，改革完善教育培养体制、科学研究体制，形成教育家和科学家大量涌现、专心立业、免于为生计奔波和报销奔波的干事创业环境，保障科技进步行稳致远、科技创新层出不穷。

建立会商机制统筹境内外一体化投资经营发展。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布局国内经济发展时应统筹考虑境外投资经营发展，建立相应的部际会商机制。境内通过推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境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经济合作共赢发展，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增强产业链修复能力和替代能力。

